



马烽潇洒度晚年

著名作家马烽(1922年~2004年)晚年患有哮喘、肺气肿、高血压等多种疾病,但他始终保持着一种乐观平和的心态,从其撰写的对联中可见一斑。

1994年春节,正逢本命年的马烽撰写了这样一副春联:

过了七个狗年,老当益壮,不可能;
奋斗半个世纪,继续革命,没问题。

这一年正是狗年,马烽已经72岁,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。虽然从生理上讲老当益壮不可能,但他对工作的热情和精力投入依然不减当年。

1995年,马烽卸任调回山西老家,这年他在一副对联中这样写道:

调进京,调出京,服从分配;
未开花,未结果,叶落归根。

横批是:回来就好。

回到山西,他即办了离休手续。

1996年,他写下这样一副对联:

年老体弱,心有余而力不足;
因陋就简,热无多且发萤光。

1997年,75岁的马烽又写下这样一副对联:

五官磨损,勉强可司职;
四肢老化,凑合能运行。

横批是:这就不赖。

在此前后,他的文坛老战友李束为、孙谦先后均以76岁辞世,山西老诗人王玉堂(笔名冈夫)也以91岁高龄仙逝。1999年,已经77岁的马烽在一副对联中这样写道:

闯过七十六周岁,超过孙李,已成定局;

迈向九十一高龄,寿比王老,无此可能。

横批是:顺其自然。

进入2000年,跨入新世纪,马烽欣然写道:

跨越两世纪,可谓高寿;
步入新世纪,从一算起。

横批是:大小由之。

这种顺其自然、大小由之,潇潇洒洒度晚年的心态,值得借鉴和学习。

夏明亮 据《人民政协报》

诺曼·法郎士: 为中国抗战牺牲的英国学者

赵唯一

诺曼·法郎士是英国人,曾任职于香港大学历史学系。他不仅是一位学者,也是一位为中国抗战事业无私奉献的战士。他短暂的一生与中国结下了深深的缘分。

加入保卫中国同盟

诺曼·法郎士1904年出生在中国,他的父亲在英国海军工作,他的叔叔在英国圣公会教堂担任教区牧师。法郎士中学时曾在广州就读,之后就学于剑桥大学,毕业后,从1938年起在香港大学担任历史学高级讲师。法郎士在香港和中国南方的城市居住了很长时间,他经常利用假期到中国各地旅行,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。他会讲汉语,也会讲粤语,能书写汉字,很喜欢与中国人交往,是一位热爱中国文化、对中国感情很深的学者。

在抗日战争最艰难困苦、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,宋庆龄号召爱国人士组建保卫中国同盟,呼吁国内外一切反侵略、反法西斯、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和团体参加,并努力向中国供应医疗和救济物资来支援中国抗战。在宋庆龄的号召下,不同国籍、不同信仰的人们,源源不断地通过保卫中国同盟汇入到支持中国抗战的队伍中,他们为中华民族抗击侵略者的最

后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,法郎士就是其中之一。

1938年6月14日,宋庆龄与一批中共党员、爱国人士和国际友人共同创建保卫中国同盟。诺曼·法郎士由他的朋友詹姆斯·贝特兰推荐参加盟的工作,成为盟的创始人之一。法郎士被任命为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并兼任名誉司库,负责物资的募集、运输及财务方面的工作。盟成员职衔前冠以“名誉”二字,意味着他们的工作都是义务的,这也是一种荣誉称号。

1941年,为加强盟的各项工作,盟的中央委员会建立了财政、运输、宣传出版、促进4个委员会。法郎士领导财政委员会。在法郎士为香港的盟工作期间,做了大量的募捐工作,募集了几十万元援助款,其中绝大部分用以购买药物,主要支援八路军、新四军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。法郎士的工作也得到了宋庆龄的认可,获得了高度赞誉。

亲自护送援助物资

1941年初,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得知,西北黄河流域地区正在流行回归热、疟疾、痢疾、伤寒等时疫疾病,许多乡村有一半的人因此丧生,许多士兵和百姓都得不到医治。那里的军民迫切需要医疗物资。在得到相关消息后,保卫中国同盟协同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、中国红十字会、中国外籍人士后备队等团体,拟定了一项救济方案。最终决定派出卡车车队将医疗物资运送到西北,再交由黄河沿岸的各卫生所使用。

1941年6月,法郎士以盟财政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积极响应和筹备物资运送工作,并亲自担任运输车队的负责人,在暑假期间率领运输

队前往宝鸡。7月24日,法郎士率车队离开韶关奔赴西北,开始了押送物资的征程。10多天后,法郎士车队一行终于到达了贵阳。不料,车队在当地的军事检查所遭到了地方当局的扣押。地方当局接到重庆方面的命令,称这批物资“是给八路军的”,因而不准通过。心急如焚的法郎士随即开始向重庆的中国工合办事处发送救援电报,寻求支援。但到8月底车队仍未得到通行许可。因临近开学,万般无奈的法郎士不得不暂时离开贵阳,返回香港继续其在大学的工作。盟得知这些情况后,通过中国工业合作社敦促,9月2日允许卡车前往重庆的通行证被送到贵阳,以保证物资被运往西北。

为反侵略献出生命

1941年12月,太平洋战争爆发,日军进攻香港。当时,保卫中国同盟的中央委员会各部门都设在香港。12月8日,日本突然进攻香港,日军军机轰炸启德机场,陆军同时从福田过境进攻锦田平原。自此,香港保卫战正式展开。开战初期,香港的社会生活秩序被打乱,一些教师被征入伍,许多学生被迫离开课堂去参加守城工作。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,诺曼·法郎士自愿参加香港义勇防卫军,进入志愿队第二炮兵连担任炮手,积极投身到了保卫香港的战斗中去。

当时邻近香港的广东等省份已被日军占领。由于缺乏外援,且香港守军与日军军力悬殊,香港守军的抵抗十分惨烈。日军认为在兵力占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可以轻而易举地攻下香港,没有料到香港守军的抵抗意志如此顽强。尽管守军中的很多人并非职业军人,而是教师、学生等爱国人士,却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过程中展现了非凡的毅力。许多地方的守军都是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才不得不放弃抵抗的,还有许多人拒绝投降,不少人为此献出了生命。

1941年12月,在抵抗日军进攻时,法郎士不幸中弹,为香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献出了生命,当时他只有37岁。

法郎士牺牲后,他的好友詹姆斯·贝特兰将其埋葬在香港赤柱地峡的堡垒大门旁边,在那里为他竖起了一座简易的木质十字架。这位生于中国、喜爱中国文化并一生致力于为中国工作的学者,永远留在了这片他热爱并为之奋斗和奉献的土地上。

抗日战争结束后,法郎士的墓被迁至香港赤柱英军墓地。2018年,前身为保卫中国同盟的中国福利会代表团赴香港开展中福会建会80周年寻根活动,期间前往祭扫了曾在太平洋战争中牺牲的、在保卫中国同盟中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兼名誉司库的诺曼·法郎士。法郎士既是一位为中国抗战事业无私付出的奉献者,也是一位面对侵略者毫不畏惧的勇敢的战士。在其短暂的一生中,法郎士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据《学习时报》